

对教育的呼声*

To Appeal for Education

孔宪铎

(香港科技大学, 学术副校长, 教授)

刚才听到了石孙校长(前北大校长)和李亦园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发言,对他们在专才与通才教育和学科之间相互关系上的申述和分析,感受很深,受益匪浅。他们所讲的都是在大学校园以内的人才培养问题,这里我想从另一角度来谈谈那些广大的、大学校门外的青年们和他们的培养问题。

首先,分析一下世界各国大学适龄青年(18~22岁)进入大学的比率。在先进的欧美国家,这个比率比较高。就美国而言,从去年公布的大、中、小学生的数字看,适龄而能进入大专学校的比率将近一半。日本在近年来亦赶上这个数字。即使注重精英教育的英国,这个数字亦从以往的14%增长到近年的25%左右。在亚洲的四小龙,除香港外,都已达到30%左右或以上。即使尚是殖民地的香港,这个比率亦迅速地由1988年的8%增长到目前的18%。可是中国大陆,此比率则在1~2%之间。这个差距实在太大了,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的青年实在太多了。

下面分析一下造成差距可能的原因。首先,我要申述的是上述比率和现象绝对不代表中国人不重视教育。相反地,中国人比一般其他国家的人更注重教育,所以才有自古以来就相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那么,产生上述问题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从家庭、政府和经费三个方面作一些分析:

从家庭而言,绝大多数父母都十分注重子女的教育,尤其是绝大多数的中国父母,都会在必要时,省吃俭用来让子女受教育。这一点表明,中国人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都更积极,更看重教育。从父母的观点看,化费在子女教育上的费用,是最好的投资,而所期盼收获的,则是下一代生活水准和精神文明的改善。这方面,在香港有很多非常成功的例子。父母经过一辈子辛劳和苦心,把所有精力、金钱全部都投入在子女的教育上,而子女的工作、生活和事业都能跳出父母生活艰辛的圈子而步上成功康乐之途。就以目前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而言,90%以上都是家庭中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的父母都没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对教育而言,家庭不是阻力。

就政府而言,各级政府都在宣示教育的重要,但政府和家庭之间在观念上确有一个基本的差别,这就是父母和“父母官”对教育的看法不同,感受不同。父母把对子女的教育看作投资,而“父母官”则看成消费;父母对

子女教育的投资是希望下一代有收益,“父母官”对任何投资都着重在下一年的收益。一般父母都会体验到和感受到子女从教育上得到的收益,而这种收益往往是不能以金钱来衡量的,一般“父母官”都不会在在职时看到和感受到在教育化费上所得到的收益和效果。由于上述多种不同的感受和心态,造成了为父母者和为“父母官”者对教育的不同看法,从而形成双重标准。这就需要有远见的政府,把教育视为人才投资,一代见效;不应视为商品投资,一年见利。但在目前经济挂帅的情况下,这又谈何容易!

从经费而言,当然像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人口的压力,能够用于教育上的经费不会很多,但这并不表示中国真的没有钱办教育。据传,1993年一年中政府各级用于请客吃饭的钱就超过2000多亿元(另一种报道是1000多亿元——编者注),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中国全国教育经费的多少倍!?所以,钱还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政策和远见,是如何决定经费使用的轻重和先后的次序。但是,这个次序是不可以在不同的时代,由不同的人来随意决定的,因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事,会对教育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所以,在教育政策上,不能人治,而必须法治。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在一切都靠人治的传统下,办好教育不易。要想找一个有远见的政策和“父母官”则非依法治理不可,也就是说,政府每年用于教育的经费,一定要在宪法上规定,政府要依法按国民生产总值的固定百分率拨款办教育,非如此,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国家都在宪法上明文规定百分之几的国民生产总值应列为教育经费,台湾在1964年为3.0%,1974年为4.0%,1984年为5.0%,到1989年已超过5.35%了;印度为4.7%,韩国为3.4%,而中国则远低于1%。

有了宪法规定还不够,一定要在各级政府执行政策者的工作上表现出来。换言之,各级政府主管的年终考绩要把办教育的成绩列为第一项,教育办不好,官运就不亨通。以上两项措施要同时并行,否则只是空口白说,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最后,我希望大家能以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心情来办全国教育,大家只要省吃俭用一辈子,下一辈人就好了,只要辛苦一代,以后代代都好。(责任编辑 蔡德诚)

* 在一次中国人才培养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